

旧石古碑：石头上的海南史

■ 曾庆江

唐朝诗人姚合诗云：“荒田一片石，文字满青苔。不是逢闲客，何人肯读来。”这是对散落于民间的各种石碑命运的吟咏。很长时间来，各种各样的古碑散落乃至湮没于民间，长满了青苔，只能偶尔碰到一两个“闲客”才会努力辨识其中的文字，认识到其中的价值。随着对地方文化的深度挖掘，各种各样的石碑开始进入学者乃至大众视野。海南各县市也遗存有众多的石碑，它们或者记录历史上重要事件，或者为地方名贤立传，或者张张扬扬淳朴民风，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海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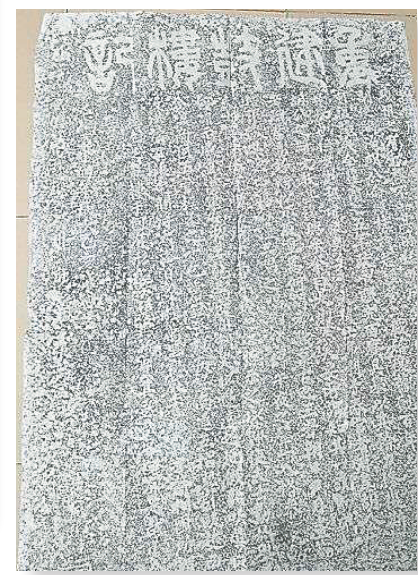
林纘统塑像。(资料图)



2015年7月中旬，丘潜后人描红后拍摄的《祭抱元境神碑》。(资料图)



叶兆言撰



撰于清代的《重建鼓楼记》拓片。(资料图)

A 记录海南重要事件

很长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正史以及地方志中集中记载海南的文字相对有限，这使得海南历史以断断续续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个时候，散落于海南各地的各种碑刻因为记录了某些重要事件，对海南历史形成某种补阙，从而给大众展现出更加全面完善的海南史。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因不堪统治者的压迫，陈明甫、陈公发以“三巴大王”的称号占据临川(今属三亚)一带，形成与朝廷对抗的地方政权，声势曾影响到漳州、潮州、惠州、广州、钦州、廉州、化州、雷州等沿海州县，并且与占城和

交趾也有往来。“三巴大王”割据政权持续八年之久，后来遭到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但是，这一史实，在正史中没有踪影，就是地方志中记载也非常简略，后人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在“三巴大王”失败之后，曾担任万安军知军的吉阳(今三亚)人邢梦瑛撰写了《节录摩崖碑记》，详细记载了“三巴大王”割据的规模之大，反抗之激烈，镇压之残酷，为后人留存了重要史料。

元朝入主中原后，实行严苛的民族歧视政策，海南居民被称为最低等的“南人”，属于被压迫和歧视的对象，而黎族遭受的压迫和歧视更有甚于汉族居民，这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抗。

为了迫使黎族臣服，元朝统治者多次出兵对黎区进行军事围剿，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军事行动。最终元军攻入五指山腹地并在黎母山刻石纪事。时至今日，“大元军马下营”的摩崖石刻遗留在尖峰岭脚下。对此，邢梦瑛以《至元癸巳平黎碑记》予以详细记载，从而为后人留存历史。

在海南，遗存在民间以记录重要事件为主的石碑并不少见。比如在琼中有明代礼部尚书、定安才子王弘海撰写的《水会平黎善后碑记》的残碑，为我们了解明朝设立水会所城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B 褒扬海南地方名贤

通过墓碑或者墓志铭对地方名贤进行褒扬，在我国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这在海南也有鲜明的体现。

宋朝以来，海南开始出现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到明清时更是人才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美誉。这些著名人物，不少在正史中有传记，已经为大众所熟知。但是，由于正史作者一般是从正统思想出发，在历叙人物生平事迹的同时，更多是对宦绩、思想等的褒扬，从而达到教化目的。而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碑文、墓志铭等，由于是熟人撰写，更多从性格方面着眼，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也更符合人物的“原生态”。

比如，被称为“海南三贤”之一的邢宥，曾担任都察院左御史等职务，有着很大的声名，但是在54岁时就急流勇退回到家乡，读书自娱直到逝世。《明史》《广东通志》等都为邢宥立传，可见

对其非常推崇。这些传记对邢宥的生平以及宦绩等评价非常高，但是对其归隐之后的情况均是一笔带过。丘潜和邢宥同为海南老乡，且交往较多彼此相互了解。在邢宥去世之后，丘潜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说到他退休归隐之后“足迹未尝至城市，一切外物略不关情，暇则抚藜徐行田间”“构草亭于所居之间文峰寺墩上，颜之曰‘濯丘草亭’，因自号濯丘道人”。这将邢宥归隐之后的生活情趣以及自号由来交代得非常清楚，让人认识到邢宥的另外一面，可谓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像邢宥这样的例子，在海南遗存的很多碑文中均有体现，它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为研究海南人物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还有不少海南地方名贤，或者是因为声名未及全国影响，或者因为史志者个人判断，未能进入正史，甚至地方志也少有其记载。但是

这些人物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闪光点，各种碑刻的相关记载就弥足珍贵。比如晚清时出生于三亚崖城的林纘统就是其中一例。

林纘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参加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的骨干力量。“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被杀，康、梁出走日本，林纘统潜回海南，闭门谢客潜心向学。民国年间，林纘统联络地方乡绅和商贾合力开发西沙群岛，后病逝于万宁。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开发西沙，林纘统的历史功绩都是不可抹杀的。遗憾的是，大家对林纘统了解并不多。遗留至今的由地方乡贤黎炳桂撰写的《林纘统墓志铭》就显得弥足珍贵。尽管墓志铭可能存在溢美之词或者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依然给我们了解相关人物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张扬扬淳朴民风

散落于海南民间的各种碑刻，更多的则是张张扬扬淳朴民风，从而成为海南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为我们侧面了解海南历史文化提供了鲜活的视角。

比如，昌化县作为海南历史上的古县，虽然其名不显，但是由于位于儋州和崖州(今海南三亚)中间，因此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内涵。宋朝著名文士苏东坡曾谪居海南三年，为张张扬扬文教事业殚精竭虑，厥功甚伟，得到海南百姓的无比尊崇。苏东坡在海南三年得以安然返回中原，他一方面感喟海南人民对他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感念山川之神对他的佑护，因此写下了《峻灵王庙碑》。

尽管学术界对苏东坡是否到过昌化县仍然有诸多争议，但是对《峻灵王庙碑》中饱满的情感态度的认可是一致的。按照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的说法，《峻灵王庙碑》体现了苏轼对峻灵王守社稷、安人民的真诚愿望，同时也体现了峻灵王庙是苏轼以及当地百姓期望平安的共同精神寄托。但是，雄文已经流传千载，石碑安在？当前，昌江昌化镇峻灵王庙前遗存有残碑。它是否是当年苏轼所刻的石碑？

经李公羽先生考证，这一残碑系建炎二年(1128年)时任昌化县令的何适所立，碑文也并不是苏轼《峻灵王庙碑》原文，而是记录苏轼撰写《峻灵王庙碑》的经过。因此，这则残碑尽管不是东坡所立，但是在张张扬扬文化方面居功甚伟，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东坡海南功绩的推崇，实际上是海南淳朴民风的体现。宋朝虽然有“不杀士大夫”的说法，但是在将官员贬至海南，其实是对其“生不如死”的惩罚，往往比杀头还残忍。苏东坡等人能够在海南安然生活并成就一番事业，何尝不是海南民风淳朴的体现？

事实上，海南民风之醇厚，从遗存至今的各地乡约石碑、捐资石碑中也可以体现。乡约石碑曾经在海南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了保护这些石碑，不少地方还为之建立了“约亭”。约亭一方面是乡村聚众议事之所，另一方面则是矗立乡约碑之所。官府告示或者村民公约等均以石碑的方式呈现，以达到广而告之并永久留存的目的。而捐资石碑则是地方乡绅乃至普通村民为修桥、修学校等公益事业捐资，成了让后人记住而设立的方式。无论是为了维持村落稳定的乡约碑，还是褒扬捐资公益的流芳碑，它们无不彰显海南淳朴的民风。

古代的砲

■ 王吴军

砲是古代的一种重型武器。所谓“砲”，其实就是“炮”的异体字。东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砲这种武器，不过，当时的砲不叫砲，而是叫作飞石。春秋时期的《范蠡兵法》中记载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关于飞石，东汉时期的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说：“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也。”意思就是，飞石是一个简单的木制装置，将石头放在上面，打仗的时候，在人工操作下，可以通过装置的力量将上面的石头抛出去，以此打击敌人。也有人说，这种飞石是在临战的时候在地面上竖起两根大木，在两根大木之间横穿一轴，轴上有一个可以绕着轴旋转的抛竿，在抛竿的两端，一端系着很多根绳索，另一端挂着要抛出去的石头(也叫石弹)。作战的时候，由许多士兵拽起绳索，让抛竿飞转起来，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拽挂在抛竿上的石头抛出去砸伤敌人。

最初的时候，砲的性能很差，抛出的石头的重量只有十二斤，抛出去的距离才二百步远杀伤力不大。东汉末年，在曹操和袁绍双方进行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在东汉时期出现的飞石这种武器的基础上，制成了名为“发石车”的武器，在这种发石车的下面增加了四个可以移动的轮子，这样一来，工匠们就可以在作坊里制造发石车，战斗的时候，把发石车推到前线使用。在飞石的基础上经过改进而制造的这种发石车，在官渡之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曹操的军队用它破天荒地击毁了袁绍军队的云梯，于是，发石车名闻遐迩，成了古代军事史上的一种远程射程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发明家和机械制造家马钧对发石车的功能和效率进行了大胆的改进，他独出心裁，进行了一次实验。马钧制造了一个大木轮，把大石头悬挂在这个大木轮上，使这个大木轮快速旋转，大木轮上悬挂的大石头也随之而快速旋转，然后，用锋利的刀突然割断悬挂石头的绳索，悬挂的石头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就风驰电掣地飞出去。马钧的这个实验成功了，飞出去的石头达到了数百步之遥。顿时，马钧和他制造的这种发石车轰动了全国。然而，虽然马钧有很多发明创造，但由于古代统治阶级腐朽没落，马钧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没有得到重视。

到了隋唐时期，人们根据“抛”的原理，把发石车称为“抛”或“抛车”，后来，又因为“抛”和“砲”同音，就把“抛”称为“砲”或“礮”，这就是“砲”这个名字的来历。这时，有的砲装在车上，有的砲装在战船上，成为当时战斗中的常用的重型武器。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曾公亮在编著《武经总要》这部书时，记载了当时制造的十六种以上的砲。

元世祖至正十年(1273年)，著名的制砲专家易思马在襄阳城下为元军制造成功了一种威力更大的砲，一举攻占了元军围困了五年之久的襄阳城。此后，人们把这种砲称为“襄阳砲”。襄阳砲的高明之处在于采用了机械代替人力的发射，这种砲是在抛竿的一端绑起来一块大铁块作为配重，战斗期间使用时，只用十几个人抬起这块大铁块，抛竿的另一端低下来与活钩接触并勾住，然后，轻轻地脱钩活钩，抛竿受到配重大铁块的作用突然翻转，把石弹抛射出去，这样一来，不仅作用力很大，而且发射的力量集中，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据说，一次可以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大石头，能砸入地内七尺深，足见其力量之大。

不过，襄阳砲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随着金属材料制造的火炮的出现，笨重的襄阳砲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火炮最早的国家，元宗至顺三年(1332年)铸造的铜火铳，长一尺一寸，重约二十八斤，比现存欧洲最早的火炮还要早半个多世纪。不过，早期的火炮装填和发射的速度慢，射程也近，后坐力大，常常出现崩伤射手的情况。明朝的时候，科学家和工匠们对火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制造出了双轮以及四轮的炮车，把火炮固定在炮车上，战斗时就地发射。

到了清朝，一直宣扬以骑射箭平天下的清朝政府对于火炮以及其他火器和炸弹的科技成果根本就不重视，康熙年间，伍连登发明了爆炸弹，如此重大的科技成果，康熙皇帝仅仅赏赐他多领一份粮饷而已，冲天炮(也就是子母炮)和连珠铳(相当于后来的机关枪)的发明者戴梓的境遇更为可悲可叹，戴梓在无意中得罪了南怀仁，南怀仁便伺机报复，诬陷他私通东洋。康熙皇帝竟然轻信了南怀仁的谗言，将戴梓流放到沈阳，晚年在贫困交加中死去。直到魏源在清朝道光年间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应对外国的侵略，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创办了清朝末年最早的官办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又称“安庆军械所”)，开始大规模并按照一定的科学要求制造大炮，然后，李鸿章和左宗棠也都纷纷效仿，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先进的后膛枪炮取代了我国的旧式火炮，使砲这种历史悠久的古代武器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文史荟

「落榜生」韩愈

■ 郑学富

《掷铁饼者》



《掷铁饼者》是希腊雕刻家米隆于公元前450年雕刻的青铜雕塑，世界十大雕塑之一。原作已经丢失，复制品现收藏于罗马国立博物馆、特尔梅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

《掷铁饼者》取材于希腊现实生活中的体育竞技活动，刻画的是—名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具有表现力的瞬间：运动员上身倒向右转，前倾成弓状，重心落在右脚上，左臂接在右膝，右手握着铁饼转向右侧。

雕塑选择的铁饼摆回到最高点、即将抛出一刹那，有着强烈的“引而不发”的吸引力。虽然是一件静止的雕塑，但艺术家把握住了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关键环节，达到了使观众心理上获得“运动感”的效果，成为后世艺术创作的典范，也是研究古希腊雕刻的重要资料。

公元前449年到公元前334年是希腊雕塑艺术的全盛时期，艺术史上称为“古典时期”，大量优秀的雕塑作品出自这个时期，《掷铁饼者》就是其中现存流传的艺术杰作之一，也是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代表作。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称，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代表著作有《韩昌黎集》等。可是，当年韩愈曾是一个“复读生”，其科举之路历经曲折磨难，连考四次才中进士。

韩愈于唐大历三年(768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仅两个月，母亲去世。韩愈三岁时，在朝中任秘书郎的父亲又离他而去，由兄长韩会抚养。韩愈十多岁时，在朝中任起居舍人的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而被贬往韶州(广东曲江)。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韩会于韶州任所病逝，年仅43岁。年幼的韩愈跟随寡母郑氏回河阳原籍安葬兄后，避居江南宣州，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韩愈自小成为孤儿，生活艰辛，不用别人督促奖励便刻苦读书，立志长大后有一番作为，以报答嫂子的养育之恩。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赶考。其间韩愈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投奔从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次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应试，结果榜上无名。落第后的韩愈在长安居无定所，生活无所依靠，饥寒交迫。他在《出门》诗中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又传来从兄死于非命的噩耗。韩愈异常悲愤，在《烽火》诗中写道：“我歌穷自感，乃独泪沾衣。”韩愈在长安穷困潦倒，缺衣少食，走投无路。不得已，韩愈在大

街上拦马求见北平王马燧。马燧与韩家是世交，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于是收留在府中，让韩愈一边教授他的两个儿子，一边研读儒家经典。马燧给予韩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韩愈后曾作《猫相乳说》以感其德。《猫相乳说》从马燧家蓄养猫儿讲起，两只母猫同一天产子，其中一只母猫死了，两只猫仔依然含着死去母猫的奶头，吃不到奶而悲伤地哀鸣着。另一只母猫正在哺乳自己的猫仔，听到叫喊，走过去将两只失去母猫的幼猫衔回，像自己的猫仔一样哺乳。这个猫妈哺育“孤儿”的故事让韩愈深受触动，联想到自己穷困长安的遭遇，不禁

感叹道：“夫猫，人畜也，非性于仁义者也，其感于所畜者乎哉！”文章颂扬了唐名将马燧的功德更加勤奋努力，挑灯夜战，攻读圣贤，准备科举考试。可是，事不如意，韩愈屡试屡败。据史料记载，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

连续落第的韩愈于贞元五年(789年)返回宣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闭门读书。贞元八年(792年)，唐德宗李适开科选士，任命兵部侍郎、著名学者陆贽为主考官。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特别是在选拔人才上，独具慧眼，为时人所赞誉。考试赋以《明水赋》为题，诗题则是《御沟新柳诗》。韩愈参加了这次科考，他在赋中写道：“明德惟馨，玄功不幸于以表诚洁，于以戒荒怠。”陆贽很欣赏韩愈的古文特色，评定为第十三名。本科录取进士共23人，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他们在日后的从政生涯和文学创作中各显神通，出类拔萃，或官位显赫，或文采飞扬，其中李绹、崔群和王涯先后坐上宰相宝座。《新唐书·欧阳詹传》说：“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绹、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

韩愈这次之所以能高中进士，与两位副主考官梁肃、王础联合“公荐”得当，陆贽评卷公正、准确有关。韩愈后来在《与祠部陆员外书》说：“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以致他在《马说》一文中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据《中华读书报》)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